

(← 上接第B2版)

社会的断裂熬到五月已经再也无法掩饰了。“家庭观”几乎可以看作美国民众世俗的宗教，而家庭成员的人生礼仪差不多就是宗教节日，尤其是孩子们的毕业典礼。今年所有的毕业礼都在云上飘，不少人家的门口，都插着大中小各类学校的毕业祝贺标志。舞会、合影、宴请都取消了，太多蓄谋已久的故事连开讲的机会都没有。5月20日纽约开了266年的哥伦比亚大学，首次线上直播“云”毕业典礼。校长李·布林格（Lee C. Bollinger）致辞，“与带给我们生活意义的人们、场所、仪式和传统分离，是回避不了的悲伤。当危机来临，社会需要大学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他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言论自由领域著名的法学者，前面一句话我感同身受，但是后面一句话我却有点犹疑。知识分子最恐怖的身份错认，就是往往记不住自己不是上帝。当下美国的知名大学，当然给了社会一些“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恐怕也给了不少“煽动、消解和破坏”。1791年第一修正案获得通过，使美国成为首个在宪法中明文保障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家。尽管学界都在虔诚地谈论“宽容”，但今日美国大学对那些挑战政治正确教条的人，又能有多少耐心去宽容呢？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师、诗人和学者都变成了它出钱招募的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里，1848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这样说。

六月：纽约无法呼吸？

纽约人是不过六一国际儿童节的。2020年6月1日，纽约宵禁。

这是二战后纽约的首次宵禁，上次宵禁是1945年2月，盟军轰炸德国，美国煤炭短缺，所有娱乐场所停止夜间营业。5月25日弗洛伊德之死事件曝光后，不少美国市民举行示威集会，要求公正审讯涉事警员和正视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但示威很快演变为暴动，堵路、店铺抢掠、破坏公物等现象蔓延全美，截至5月31日，33个城市宵禁，27个州出动国民警卫队。弗洛伊德死前最后所说“我无法呼吸”成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新的口号。5月31日周日晚间，纽约下城熨斗区和苏荷区遭纵火抢劫，包括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梅西旗舰店。6月1日市长宣布当晚11点到2日5点宵禁，之前还未安装防护板的店家一夜之间紧急行动起来。6月2日白思豪再令从3日晚8点开始到8日早5点宵禁，提早到日落前20分钟，曼哈顿96街以南车辆禁止通行。当天的大新闻是，萨克斯第五大道雇用了一列私家保安和至少7条德国黑背和斗牛犬，严正以待。为了复市，宵禁提前一天结束，但暴乱让8日所谓的“复市”成了空头支票。9日，我穿行在曼哈顿麦迪逊大街这条纽约标志性的高档商业街上，从96街数到50街，走过四十多个街口，上着板且关着门的店家不下80%。我走到萨克斯门前，问黑人保安泰拉怎么看，他严肃地回答，“我在纽约做了25年的私家保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阵势。”

疫情一百天之后，巨大的纽约像一头搁浅在北美大陆东岸的死鲸，鲸爆终于来了。各种丑陋，大白天下。疫情已经无法成为任何一方的幌子，人群密集的抗议示威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酒吧街边的饮酒青年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正确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媒体在互相揭露中各取其辱。政客秀脆，教授蒙尘，历史雕像被毁。来自波兰、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或

者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东方阵营”移民，更为敏感和惊惧，“Fire, Riot and Looting（造反有理）”、“Defunding the police（砸烂公检法）”、“Silence is not a choice（人人表态过关）”。极端思维，笼罩全城，纽约似乎已经无法正常呼吸。

我确实认识一名相当成功的白人剧作家，得过包括艾美奖在内的不少行业大奖，他的想法和做法在美国影视圈里自然是极“主流”的，比如，他下载了此次抗议的专门软件，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市区的所有游行；他们认为特朗普是万恶之源，只要谁支持特朗普谁就是种族主义者（我对好莱坞正在传染的情绪和逻辑，同情却不能理解。特朗普显然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社工系的教授高呼“只有黑人的命是命，其他的命才是命（All live matters after black live matters）”，认为维护社会正义比防止社会停摆更为重要。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被推为当下美国“黑权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其中的激进派是由五十多个核心组织互相协作的运动联盟M4BL，即Movement for black lives，“黑生命运动”）的领袖，2014年开始他推动刑事司法改革，理由是黑人在美国被捕和被监禁的人数占比高；2017年身为黑人的他呼吁联邦政府停止维护杰斐逊纪念堂，因为这位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曾有600名奴隶，“人们要知道自己被奴役了，咱们的家人都是受害者。用公共经费维护这些纪念物，就是要咱们出钱去羞辱亲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也是黑人，他在推特上直言：“把人们领进依附和不满的死胡同，可能无助于改善他们的处境，但那些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者之友’的人，却可以名利双收”，“无论政治左派的意识形态或修辞是什么，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议程一向是：代替别人做决定，并管制他人的生活。”我在加油站遇到前联邦众议员维托（Vito Fossella），“在我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见到商业大公司发声支持暴力抗议，第一次见到好莱坞明星为被警察拘留者付费保释。左派已经极左到吓人了。马丁·路德金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个大右派，和白人‘一个梦想’？政治极不正确。”退休的狱警保罗打开他的枪柜，给我看他私有的各式枪械，“解散警局？出了事为啥只会打911呢？这帮没良心的！美国百姓为什么不放弃持枪权？就是因为要是王八蛋的政府想操蛋，胆敢侵犯我的财产，改变我的美国，老子头一个扛枪出阵。”如果我们愿意去听，这些人的想法里多少有些真相甚至真理的影子，大家的手中都掌握着解决顽疾的密码中的几个字符，但问题是彼此不能或者根本不愿意交流了。人们选边站队，所谓的“民主”成了“一个美国，两种表述”，人们鸡同鸭讲，风马牛不相及；而政客们无不仗着大众的名义兴师动众。人民统统成了人质。

“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6月2日《费城问询报》发表一名建筑批评家的专栏文章《建筑也重要》（注意英文标题“Buildings Matter, Too”），8日执行主编因此辞职；6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名参议员的观点文章《派军队来：国家需要恢复秩序，军队随时待命》，7日该报评论版主编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因此被迫辞职。美国新一代的所谓“警醒”（woke）文化，以急风骤雨般的“删除攻势（cancel culture）”加“点名攻势（call-out culture）”，向秉持“客观



▲ 34街8大道15层楼高的墙画，结合了多种族裔面部特征的护士形象。

中立公正”的公民自由主义传统的新闻观念，“气昂昂”地发起了“倡导式新闻”的大会战。美国主流媒体的代际更替轰然而至。文化思想的自由不可能一下子公开消失，它有可能被神圣的承诺和高尚的理念一点一滴地夺权，有可能被拒不对话的偏执蛀空，更可能是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放弃了独立思考而被“平庸之恶”（准确地说是“从众之恶”，里面还有很多仗势自欺的懦弱）吞噬。没有了思想自由及其标志性的言论自由，美国还何以成其为美国？

我在被洗劫后的苏荷区的弹街路上，高高低低地读那些防护板上的涂鸦。等在街边的黑人司机肖恩见我走了好几个来回，与我攀谈起来。他的祖母从索马里来，他出生在布鲁克林，“我34岁了，日子这么不安生，可是头一回，咱纽约不带这样的。”我说，“纽约现在乱是乱的，但可以这样明火执仗地对着干，也是别的地界少见的。”

“我爱纽约”，我和肖恩几乎同时异口同声，又几乎同时下意识地伸出了手。我们随即意识到，这样做现在是不正确的。但我们还是在夕阳里有力地握别，“珍重（Be safe），珍重”。这句疫情期间兴出来的告别语，如今有了越来越多的意涵。

1946年也是3月，“局外人”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乘船驰入纽约港，一年以后，他也回想在纽约度过的一百天，写道，“我爱纽约，那强烈的爱有时留给人的，全是无常与恨意”。

本文删减版首载于澎湃新闻，完整版经作者授权，本报首发。

文中照片均由作者提供，版权归属作者。